

资料、知识和理论：浅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学法

汪仕凯*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基石，其在当代中国高校政治学教学与科研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熟悉并且通透地掌握资料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教学的基础，由一个中心、两大支柱、三者有机统一、四种基本政治制度和四项基本政治权利、五环政治过程共同组成的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而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理论、中国政治创造能力理论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知识；理论；中国

一、复旦政治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基石，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自然而然地是中国大学政治学教学体系的核心课程。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学法方面的一些问题，我结合自己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谈一谈初步的、尚不成熟的认识。

* 汪仕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坦率地讲,这其实是比较有难度的一门课,或者说,这门课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据我了解,现在国内高校的政治学系里,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门课的不多,只有较早发展政治学科、这方面比较有传统的学校,还在坚持开设这门课。大家都已经听了陈周旺老师讲政治学原理教学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跟政治学原理有联系,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说我们要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可能要像开设政治学原理课程一样,需要具备非常系统的知识储备。对于政治学专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从大一开始学习,一直到博士毕业,十年里所接受的政治学的专业训练,可能并不能够为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提供必要的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一套不同的知识体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教学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一是课程准备,这是对于教师本人而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学既然有难度、有门槛,那么如果教师本身没有做好准备,这门课就很难上好,所以充分的课前准备是讲好课程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门课难就难在课程准备上。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如果没有非常扎实的准备,这门课就很难将其知识以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二是课程内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所要呈现的具体知识。这门课程的具体知识主要有两个来源,既有复旦政治学前辈们的探索和贡献,也包括学界同仁们做的研究积累。三是理论创新,我们既要讲授知识,还要从知识上升到理论,理论化程度高、逻辑性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门课的特点。理论可谓是知识的精华,它是用概念对知识内在的因果关系进行的抽象表达。我们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分析中国政治之后,一方面会形成许多一般性的认识即具体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将具体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发现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复旦政治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和传统。20世纪60年代初,复旦大学根据中央的指示开

始恢复政治学。^① 在复旦大学恢复政治学伊始，马克思主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期，复旦政治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② 到今天已历经60多年，我们一直在坚持，复旦政治学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了很多资源。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编撰了《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这本书已经再版过很多次了。在学生时代，很多老师叮嘱我们：这本书一定要好好读，复旦政治学培养学生、做研究，“根”就在这本书里。

同时，我想强调的是，复旦政治学的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但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复旦政治学在知识体系上是多元一体的，在精神气质上是中正平和、兼容并包的。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吸收欧美国家的政治学知识，曹沛霖老师主持翻译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③还主编过《比较政府

^① 复旦大学在1960年以马列主义教研室为基础建立了马列主义教育系，1962年改名为政治学系，1964年定名为国际政治系。据孙关宏老师回忆，尽管1960年系的名称是马列主义教育系，但是“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该系就采用政治学专业教学方案，专业定为政治学”。而且，孙关宏进一步认为，在短短几年间，系的名字几经变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演变逻辑的，“一旦政治课程学科化的需求成熟时，政治学科的影响力便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得到重点发展，为20世纪80年代复旦政治学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参见孙关宏：《复旦政治学的历史渊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整、转向与恢复（1923—1966）》，《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② 为响应“政治学要补课”的号召，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于1979年先设置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随后又将其改名为政治学教研室。教学的主要内容主要是恽代英、邓初民等建立的由阶级论、国家论、民族论、政党论等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复旦政治学的根基，并且在后续发展中得到了坚持。相关情况可参看王邦佐的回忆文章“勤于学习，勇挑重担”和孙关宏的回忆文章“国政系，我精神的家园”，两篇回忆文章均收录于《国务学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一书。

^③ 据曹沛霖回忆，阿尔蒙德在这本书里使用了很多在当时不为国内学者所知的新概念、新话语，例如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等等，究竟应该如何贴切地翻译这些新的概念、话语，同时应该采用怎样的书名来概括阿尔蒙德贡献的这套新的知识体系，这些在当时都是颇为棘手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曹老师和合作者选定“比较政治学”（而非“政治比较学”“比较政治理论”等）来系统化地表述这套现今已为国内学者所熟知的知识体系。

体制》教材，曹沛霖也在很多次会议上讲到当年他们编写这本教材时候的经历。新千年之后，曹沛霖把他在教学中的心得，以及跟学生讨论交流时候的一些新想法，汇编成了《制度纵横谈》，该书最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增订版，书名改成《制度的逻辑》。

最近20年是复旦政治学大发展的时期，发展的成就得益于兼容并包的态度。2021年，刘建军教授写了一篇回忆王邦佐老师的文章，其中讲到王邦佐喜欢用“层”来形容复旦政治学的老师和学生。一般来说，我们习惯使用“一代又一代”，王邦佐老师喜欢用“层”，这其实体现了他对复旦政治学理想和现实的认知。我对这种现实和理想的体会是，复旦政治学是一个群峰竞秀、层峦叠嶂、气象万千的大政治学科。

以上是我在具体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学法之前强调并希望大家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复旦政治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我们的传统，但我们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就是复旦政治学发展到今天一直比较兴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资料基础

对资料的熟悉乃至通透的把握是讲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难点，所以教师为了上好这门课，需要做好以掌握资料为重点的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源”和“流”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计划，他除了写作关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等问题的论著外，还想写一部系

统的关于国家的论著。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政治学其实就是国家学,但后来他没有完成。^①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政治问题的论述,复旦政治学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些论述整理出来写成了《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第二个是列宁主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了很多非常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理论,创造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学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一个重要判断,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历史理论,而列宁的学说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②亨廷顿虽然不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解却是有见地的。列宁的政治学说内容丰富,举其要者,有先锋队理论、革命领导理论、帝国主义理论,这三个理论都对我们国家和中国政治学具有重要影响。复旦政治学的元老陈其人老师就将研究兴趣主要放在帝国主义理论上,现在国内研究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并不多,但随着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帝国主义理论可能又会变得引人注目。第三个是中国人根据历史和经验自己创造的政治学说,主要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人民民主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流”就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具体经验。“流”与“源”是同等重要的,学术界关于“源”的研究比较多,而且很多学者其实研究得已经比较精深了,但是我们现

^①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32页。]据此推知,马克思有过撰写专门研究国家问题的计划;并且,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马克思针对“林木盗窃”问题写过政治评论,后来“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又促使他去追寻“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于是为了解决使其“苦恼的疑问”,就有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因此,虽然马克思没有关于国家问题的专著,但是国家问题始终存在于他的问题意识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算是马克思在研究中种下的问题意识的一个果实。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沈宗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0页。

在对“流”的研究还不够,比较弱。集中而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的认知,以及从认知到知识、从知识到理论的学术工作,还有待于系统、深入地努力去完成。《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讲到,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①这个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从中产生了大量的知识和理论,等待政治学者去发现、整理。

从政治学教学的现状看,无论是学生还是已经走上教学岗位的老师,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政治学教学的主要内容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欧美国家吸收过来的现代政治学知识,这些知识中基本没有反映或者说很少反映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经验。由于这个原因,复旦政治学现在特别重视本土化、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创造。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面临的任务是很重的,我们如何基于“源”来认识“流”,从“流”来进一步发展“源”,并且把蕴藏在“流”之中的经验进行知识化、概念化、理论化,这是一项艰巨的学术挑战。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资料

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需要阅读很多文献,经典文献则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如果教师对于经典文献没有读过或者还比较陌生,那么讲授这门课程就没有基础。文献是矗立在教师面前的一座必须攀登的山峰,只有登临“绝顶”,教学和科研才会“一览众山小”。

首先,通读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问题的经典著作。一是《马克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有一门依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研究生课程，内容就是精读其中大概十多种作品，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犹太人问题》《法兰西内战》《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论东方系列）等。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文集和选集的差别在于，前者把《资本论》三卷放进去了，还把马克思1857—1858年、1861—1863年、1863—1865年的经济学手稿放进去了。为什么要在文集中添加手稿呢？因为，在马克思生前，《资本论》第二卷只有初稿，后经恩格斯修订才完成，而《资本论》第三卷则主要是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手稿编的，所以手稿和《资本论》有些不同。当然，如果我们读了《资本论》三卷本，再加上选集，其实也够用了，不一定要读文集。

三是《列宁选集》四卷本。其中有很多论述政治问题的经典著作，包括《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

四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经典篇章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之所以经典、重要，因为它分析的是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开篇就写“中国向何处去？”^①第一句话就能吸引住人。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关键阶段写的，它指出中国有一个值得奋斗、去争取的光明前途，这就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人民共和国制度的基本构想都出自这篇文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2页。

五是《毛泽东文集》八卷本。《毛泽东文集》特别好,在内容上和选集并不重复。文集的特点就是比较口语化,不像选集那样经过了反复修订,文集中很多内容都是毛泽东的口头报告,比如选集中的《论联合政府》是书面报告,非常正式,而文集中收录了几篇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会期间的口头报告,就是他在大会上根据提纲做的口头发言,由现场的人记录下来,再经过毛泽东自己审定,最后收录在文集中。这些著作生动活泼,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事人在面对当时的难题时,他的所思所想,想得很透彻,讲得很细致。我们要了解一个事件的发生,就要回到历史情境里,理解当事人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决策?他对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分析的?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这类文献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只看选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文集。

六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卷本。它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了,有很多的批示、批复和电报,是重要的史料。从事历史学研究,特别是从事中共党史、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同仁,用此文稿比较多。而对我们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文稿读起来就有点难度,感觉内容很零碎。读懂文稿要求我们对历史线索比较了解,尤其是对历史情境要有一定的理解,否则我们读这些文献就会觉得比较枯燥、一时难有收获。

七是《邓小平文选》三卷本、《江泽民文选》三卷本、《胡锦涛文选》三卷本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问题的论述,基本上都可以从中找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风格和《毛泽东文集》比较像,既有书面化的形式,也有口头谈话的特点。

八是中共中央的文献选编。目前出版的有建党至建国的文献选编二十六卷、建国以来的文献选编五十卷。除了连续出版的汇编合集,还有如《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类的五年时限的文件汇编。这套资料不仅有中央的文件,还有一些地方党委和中央

机构的党组织针对特定问题给中央写的报告,以及中央经过开会讨论对这些报告作出的批复。文献选编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历程中的重大事件的展现,实际上可以将其看作是“百年事件史”。我们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这是不可或缺的系统性的资料。当然,读懂这套资料的前提也是要对党史比较熟悉,只有如此我们再去这些资料时才会更有收获。

其次,熟读马克思主义政治史著作。中国有着悠久的修史传统,并且主要修政治史。政治和历史是不分家的,我们如果不懂历史,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历史情境落入形式主义、抽象主义的泥沼,对政治学知识的理解也会由于脱离历史经验而比较机械。复旦政治学在培养学生上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看书既要读政治又要读历史。以下政治史著作对于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而言是必须要读的:一是《毛泽东传》四卷本(新版是六卷本),我们要了解中国现代政治史,围绕着作为最主要决策者的毛泽东,了解以他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就非常重要。而且,《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也代表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修史的很高水准。二是《毛泽东年谱》九卷本(建国前三卷、建国后六卷)。三是《周恩来传》,《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配合起来看更好。四是《邓小平年谱》五卷本,尤其是1978年以后的部分大家要认真看。五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目前一共出了两卷,每一卷都有上下册。上面提到的传记的主要编写者是金冲及先生,金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写过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四卷本,是一部比较简明的中国现代史,看完之后我们能够对整个历史脉络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另外,胡绳先生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可以说是一部简明的党史,也是一本很好的党史教材;胡绳先生还写过一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主要是写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历史,书中不仅有很多史料,而且比较集中地写了他们那一代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最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著作。一是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副主编是林尚立老师和孙宏宏老师。二是刘德厚老师撰写的《广义政治论》,刘老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大学政治学的主要奠基人,这本书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狭义的政治之外提出了广义的政治。刘老先生认为政治就是对人类劳动利益的全局关系进行调控的活动和过程,因为只要有集体生活就有公共利益,只要有公共利益就会有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公共利益,而政治就是由这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公共利益支配的公共权力的活动和过程,所以,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政治生活。^① 这即刘德厚老先生持有的广义政治观。三是王浦劬老师主编的《政治学基础》,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王浦劬老师和他的团队从利益出发演绎出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四是林尚立老师写的《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这本书可以说是林老师研究中国政治的集大成之作。五是陈明明老师写的《马克思主义政府原理的中国逻辑》,陈老师在西方代议制政府理论之外,根据当代中国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过程,提出了代表制政府理论。最后一本是由刘建军老师领衔、包括陈周旺老师和我在内的复旦大学政治学

^① 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在《广义政治论》中有多处段落论述政治的含义,比较重要的论述主要有:“以公共权威性力量来调控与保护社会成员的劳动生存的全局性利益,成为了所有社会的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和活动的内在需求。政治生活成为了所有社会成员生存的必要条件。政治的最一般性本质,就是对政治主体的劳动生存利益全局的调控。”(第13页)“政治是社会的政治主体的利益全局关系所支配的社会公共权力活动。在阶级对抗性的社会中,政治主体的全局利益集中体现在国家政权上,所以阶级的政治核心理所当然地可以被理解为是国家。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本质理解为社会的政治主体的全局利益关系,那么当社会的经济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社会利益关系的全局性地位时,经济就不仅继续发挥着它的物质基础作用,而且要直接发挥其政治功能作用,经济即成为解决政治主体的全部利益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的一种途径、方式和手段。”(第80—81页)“广义政治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以人为中心的政治主体,并由其历史惯例或者法律规范确认的社会利益全局关系所支配的公共权力或权威性的活动和过程。也就是说,人是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社会利益全局关系是形成政治活动的基础,公共权力或权威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政治过程就是政治实施的艺术。”(第114页)

出身的学者共同完成的《政治逻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这本书是复旦政治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领域的最新作品，核心内容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比较全面地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并且将这些经验知识化、理论化，这本书可以算是《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续篇。

（三）区分形式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义理博大精深，同时著述内容也非常丰富，在其内部其实包括三种不同的逻辑。

一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在我看来本质上就是数学证明过程中的规则，或者说数学可能体现了最完美的形式逻辑。数学证明过程就是从已知条件出发，通过已知条件推导出新的条件，再把这些条件组合起来推导出最后的结论，这就是形式逻辑。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实都必须具备数学证明的思维，缺乏这种思维能力将会对学术工作造成很大的麻烦。我们可以不做定量研究，但我们必须要懂形式逻辑，具有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思维能力，掌握证明过程的逻辑规则。如果我们关注马克思，就会知道马克思的数学功底是非常厉害的，他甚至对数学中的某些领域很有研究。^①

二是历史逻辑。我们也可以把历史逻辑称为实践逻辑，因为实践跨越了时间并在长时段展开就变成了历史。实践逻辑就是说事情本身是怎么发生的，其中时间顺序是基准。比如说，一战之后召开了巴黎和会，在和会上，当时的中国政府诉诸战胜国立场来主张自己的正当权利，但是日本基于它和列强的密约提出了侵略中国的殖民要求，从而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在此之前，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格局，证明了先锋队政党领导革命走向成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就特别提到：“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777页。

功的现实性；俄国布尔什维克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以及其中的政治契机，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启蒙下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靠拢，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这些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就是历史逻辑。

三是理论逻辑。理论逻辑指以简约的方式对历史逻辑进行的抽象。不可否认，当我们使用“历史逻辑”这一表述时就已经暗示理论已经介入其中，但是我们同样要注意“抽象”“逻辑”等用语表示历史有其本身的联系。很多时候，我们会混淆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然而，在头脑中，我们必须有一种清醒：理论只是对历史的认知，理论不是历史本身。尽管马克思主义追求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但恩格斯讲得很清楚，这种统一之后的逻辑与历史本身也是有差别的。所以，理论逻辑不等于历史本身。^① 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判断，但不等于说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经济基础都在决定上层建筑，很多时候政治是起反作用的，这种反作用往往具有决定性。再例如，马克思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前提，只有西欧几个发达国家共同搞工人阶级革命，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列宁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落后的俄国通过发挥先锋队作用，打破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落后俄国的十月革命反而成功了，而西欧的革命却没有成功，但是革命成功的俄国还是要回到发展生产力的轨道上，否则不足以巩固和发展革命建构的上层建筑。这就说明历史和理论之间是有差异的，二者不能等同起来，它们的统一也不是“严丝合缝”的。既然历史没有按照理论预示的方向发展，那我们就要去解释为什么会如此，然后去发展理论。如果理论与历史完全统一，那理

^① 恩格斯说：逻辑是把握历史的“唯一方式”，思维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前后后的形式上的反映”，但是“这个反映是经过修正的”，当然这种修正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论就“死掉了”，就没有发展了。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知识构成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但是在 21 世纪的中国，在当下，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其核心内容就是要讲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讲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必须解释以下几个基础性问题：人民共和国如何建构的（它从哪里来）？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形态、政治过程和运作机制是什么（它是怎样的）？人民共和国的价值基础和理想目标是什么（它将向哪里去）？围绕上述问题的研究及其不断取得的进展，将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知识。

根据中国政治学界前辈的研究和我自己对这些研究的理解，可以将这些研究内容概括为“一二三四五”组成的知识体系。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中心、两大支柱、三者有机统一、四种基本政治制度和四项基本政治权利、五环政治过程。

（一）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我们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人民”概念是最重要的基础性知识。坦率地讲，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如果我们讲不清“人民”这个概念，那后面的很多论述都是很难成立的。但是，很多人之所以会讲不清“人民”这个概念，我认为基本原因是没有对中国政治中的“人民”与西方政治中的“人民”作区分，没有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没有从当代中国政治的经验过程去理解“人民”。对于如何理解“人民”概念，毛泽东的著作讲得比较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怎么给新中国定国号、为什么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都有精辟的

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反映了他们那代革命者在认识“以人民为中心”时的历史经验。^①

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的根基,然而在当代欧美国家的政治中,人民几乎只是一个象征,所以在西方现代政治学中,“人民”就被解释成一个抽象整体。从事世界史和政治史研究的学者,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基础。我读过李剑鸣的一篇专门讲美国人民的论文,在文中李老师回应了一个问题,美国也是以人民名义建国的,为什么西方要搞间接选举,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要限制大众的政治参与。长期流行的解释是技术受限。现代国家地域广、人口多,当时的技术条件不支持搞大众民主。诚然,这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却不是历史的全部。法国也好,美国也好,都经历过大众参与的革命,精英一方面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恐惧人民的力量;一方面要借助人民的名义来论证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革命之后又不想让人民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担忧人民的参与会带来不利的影晌。^② 所以,通过代议制度限制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削弱民众在政治中的影响,并非全是技术限制所致,更为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精巧的制度设计导致的后果。这就是说,将人民局限在抽象整体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这一点其实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已经有很好的说明了。无怪乎,法国、美国在革命之后就放弃了组织人民从而维持人民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努力,代议制、政党竞争、利益集团等政治机制都在分化人民而非组织人民,人民自然在实体上只能处于“部分”甚至“碎片化”的状态。西方政治学将“人民”视为一个抽象整体,实际上就是学术工作对

^① 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论述可以查阅他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以及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李剑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这种政治状态的反映。

在中国政治中，“人民”则是一个实体。人民不是自然形成的实体，而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由党和广大民众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实体。中国共产党首先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先锋队，然后借助统一战线建立了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庞大的组织网络，从而把人民组织起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不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才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由此可见，中国政治中的“人民”和西方政治中的“人民”虽然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历史和经验事实则高度差异。中国政治中的“人民”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依靠党的组织网络把民众组织起来从而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质论之，人民是政治过程塑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使命就是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在领导革命和治国理政中面临的最根本挑战就在于能否把人民塑造出来。

“人民”形成之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人民内部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人民主要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党本身，二是广大民众。我们过去讲四大阶级，经过 70 年，中国的阶级结构不是简单化，而是复杂化了，党群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有一个初步判断，人民内部的支撑结构发生了变化，最早是党与阶级的关系，为了把阶级联盟塑造成人民，在抗战时期我们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群众路线，于是就叠加了党群关系。作为人民内部的一种支撑结构，党与群众关系的内涵就是要通过走群众路线，借助政治整合过程，将最广大民众的力量汇聚起来，进而形成人民。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民内部又发展出了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只讲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这是我们熟悉的，但对于中国来说，党与公民的关系是个新议题，我们还没有深入地研究。

“人民”是中国政治的基础问题，学界对这个基础问题的探讨

并不深入或者说没有深入展开。我认为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些研究者局限于从西方观念、历史经验来理解“人民”,而不考虑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中国的政治、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都是以“人民”为基础构建的,这就跟我们熟悉的西方现代政治学有很大的隔阂,如果完全用西方的政治知识体系,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的前辈也有这样的感受。据我的一位老师回忆,在留校任教后想写一本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著作,当时头脑中也满是西方政治学的理论,解释不通中国,就只能硬解释。后来西方的学者也发现用自己的那套知识体系解释不了中国,就采用变通式解释,于是在西方的理论上“打补丁”。这种局面恰恰证明,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形成自主性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实践。

总之,首先要将“人民”概念讲清楚,讲清楚中国现代政治中的“人民”和西方现代政治中的“人民”之间的差别,通透地理解中国人民所要集中表达的内涵以及背后的政治经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的制度设计和政治过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为数不多,但已经出现了不错的成果,王绍光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研读他的研究,我们能够发现,结构上、制度中的人民是如何出现在政治过程中并发挥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政治过程塑造人民的。^①

(二) 支撑人民共和国的两大支柱

支撑人民共和国的两大支柱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国家权力结构中的

^① 参见王绍光:《人民至上:“人民”、“为人民”、“人民共和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亦可参见王绍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橡皮图章”，这是他们不懂人民共和国的典型表现。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发展阶段，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但是现在，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人民代表大会越来越重要。中国共产党要依法执政、依宪执政、民主执政，都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没有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支柱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核心，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构成了两大支柱。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最高领导力量，另一方面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那么在政治过程中，党如何领导国家权力机关？也就是说，两大支柱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必须要解释清楚的问题。更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最高领导机关，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两个“最高”如何衔接？如果在课堂上我们不能够根据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把这个问题讲清楚，那就说明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把握出现了混淆或者说脱节。

两个“最高”如何有效衔接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当然，首先是在政治实践中解决了，然后在理论上也解决了。简单地说，最高领导机关通过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来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党不是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外对它发号施令，而是通过法定程序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来运作最高国家权力。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体运作方式，陈明明老师在他参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做了很好的归纳，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领导的具体机制。就党领导人而言：一是在人大代表的构成上，大约有2/3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从而实现党员与人大代表的同构；二是在人大常委会中设立党组；三是一种非常关键的机制设计，就是在人大开会期间，各级党委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进入人大

从而运作人大。

以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国人大为例,在全国人大每年开会期间,中共中央会专门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领导全国人大的议程和运作,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基本上都会是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这个领导小组主要的工作机制有三个,一是大会主席团,二是各个代表团党委负责人组成的联席会议,三是各个代表团成立的临时党支部。^①这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共中央领导小组为发动机、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期期间组建的各种党的机构为构成要素的系统的组织网络。从政治实践和现有的研究看,在中央层级,党如何领导人大已经形成了成熟定型的制度。

(三) 三者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在中国的政治过程中必须兼顾三者,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共同构成了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或者说,当代中国政治就是有机统一政治。有机统一政治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中有三种基本的治理资源,分别是党、人民的参与和法治,这三种治理资源要相互协同。所以,我们认为既然是不同主体、不同治理资源的协同,那么有机统一政治其实是一种“治理性质”的政治,这种政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创造美好生活,推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②进一步讲,有机统一政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良治善政的创造和追求,这也使我们国家的治理过程与欧美国家的治理过程区分开来。

^① 关于中共中央如何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从内部领导全国人大的问题,参见何俊志:《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中国人大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 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是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的论述,参见拙文《有机统一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内核》,《学术月刊》2020年第2期。

当然,更切实的问题在于回答如何做到三者有机统一?根据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目前的研究成果发现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根基在于人民,只有回到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的人民,才能找到三者有机统一的立足点。而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具体路径有三个:一是由国体提供基础,二是由政体提供结构性支撑,三是由具体治理体制的运转提供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设计,由此可见,政体是三者有机统一能够成立和发展的关键。有机统一政治尚待继续发展完善,目前有赖于在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继续发展、持续积累。所以,我们讲三者有机统一,并不是说它已经非常完善了,而是指它的结构性面貌已经成型,当代中国既要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政治的成熟形态来追求,又要将其作为支撑治国理政的核心资源来使用。

(四) 四种基本政治制度和四项基本政治权利

人民共和国已经形成了成型的政治制度体系,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四种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又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穿在四种基本政治制度之中,使其成为一个彼此协调、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

四项基本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四种基本政治制度,我们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相关课程学习中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对于公民的四项基本政治权利,教学和研究中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所谓加强就是指,要将公民的四项基本政治权利,提高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建设人民民主的战略性基础的高度来认识。我认为,关于公民四项基本政治权利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十七大政治

报告中得以定型,并一直延续下来。^①

中央对于发展人民民主的最新战略规划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就更加突出了四项基本政治权利的战略地位。发展全过程民主的基础、实践中的抓手、具体的运作机制,都与公民的四项基本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第一,知情是前提,党务、政务要公开,要让老百姓知情。第二是参与,参与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选举,二是协商,选举是基础性环节,协商是关键性环节。第三是表达,老百姓要有可以去讲理的地方,同时老百姓的意愿要让党听到,只有如此,才能沟通上下,化民意为民心,以民心引导民意。^② 第四是监督,之所以要有监督,是因为现代政治都是“代表政治”,尽管人民民主是复合民主,既有直接民主又有间接民主,但是当下以及将来很长时间里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就非常重要。在四项基本政治权利中,实质意义最大的就是监督权,发展全过程民主,提高人民民主的质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四项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好,而监督权又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在论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时讲道:“扩大党员和群众对于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7页。]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中共中央对此表述有了发展,将“选择权”改成了“表达权”,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将这一表述的位置放在论述“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部分里。[参见《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5页。]十七大政治报告的新表述中有两点值得说明:第一,“选择权”类似于选举权,而选举权是参与权的组成部分,在当代中国政治中,选举与协商共同构成了参与权的基本内容;而“表达权”则是一种独立的权利,需要单独存在;所以,将“选择权”归并到“参与权”中,新增“表达权”,体现了一种发展。第二,政治报告中论述四项基本政治权利的位置更重要,不是将其放在某个具体的政治领域,而是放在人民民主这个根本议题上,体现出保障四项基本政治权利是涵盖社会主义政治全部领域的。

^② 民意是对私人利益的反映,民意的基本内容是公民的个人利益,所以在性质上民意是私人的,在范围上民意是有限的,在层次上民意是个别和地方的,在时间上民意是暂时的。民心与民意是相对的,它是对公共利益的反映,民心的基本内容就是公共利益或者说人民利益,因此在性质上民心是公共的,在范围上民心是全国的,在层次上民心是整体的,在时间上民心是长远的。

（五）五环政治过程

五环政治过程就是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实,关于当代中国政治过程由多个环节组成的表述很早就有了,最新变化是明确当代中国政治过程包括五个环节,而且五个环节是彼此衔接的,需要将当代中国政治看作是一个完整过程,即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五环政治过程中,需要重点讨论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现在特别重视发展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挥了巨大政治效能的政治机制,今天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看清楚这一点,大家对于协商和选举的关系便不会出现模糊性认识,不会以为强调协商就是不重视选举。选举和协商对于人民民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是说有了协商就可以忽视选举,实际上两者不可互相取代。中国共产党的表述也是非常清楚的,选举和协商是发展人民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协商非常重要,它更加契合我们这个时代发展人民民主的思路,满足了在新时代提高人民民主质量的需要;与此同时,选举也是非常重要的。

选举是现代政治的基础,选举其实是承认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判断,人民群众行使选举权意味着国家组织政治生活的微观基础发生了变化。^①只有人民群众都拥有选举权,才有现代政治。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现代国家,我们的政治是现代政治,根本的基础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了选举权、实现了政

^① 法国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龙对普选权进行过历史考察,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政治世俗化世界的“圣事”,因为普选权是一种“建设性的权利”,甚至可以说,以普选权为标志的平等的政治使人成为了人,“政治平等标志着最终进入由个人组成的世界”。参见[法]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吕一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治解放、取得了政治主体资格。人民共和国对于选举权的确认在宪法上规定得非常彻底：一方面，在权利资格上，公民不分文化程度、民族、宗教信仰，只要年满18岁，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另一方面，在权利行使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构成贯彻了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的原则。1953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普选，当时大概有3亿人参与了投票，如此大规模的选举在世界民主政治发展史上也是首次。时至今日，中国的选举制度日益完善，参选的规模更加庞大，人民民主的基础更为牢固。总结而言，选举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基石，而协商在推进中国民主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著，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新理论

在我们进行了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知识讲解之后，还应该有一些理论性的回应，实现从一般知识到理论的“飞跃”。根据人民共和国政治实践提供的经验、具体知识，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三个方面的理论。

（一）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

中国政治发展不是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里讲的那样，是以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为归宿的过程；中国历经几千年之所以还是中国，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能够坚持利用普遍性资源来发展自己的特殊性，在坚持自己的特殊性时拓展普遍性。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普遍性资源，但中国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加以改造，加以创新，形成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建构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实行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为内核的政治制度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很多同仁都习惯用民族国家来定位人民共和国。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的重要讲话里对这个问题做了回应:中国不是西方现代政治学所界定的民族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如果把前面分析过的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进行系统化整合,形成理论,那么就可以用大一统国家来定位中国。大一统国家是一个和民族国家对称的概念,至少自西周开始,中国在三千年时间里始终是大一统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则是现代大一统国家。现代大一统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都是现代国家的一种类型,相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现代大一统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新类型。

西方有一种预设,1840年以后中国处在那么不利的环境中,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的命运应该跟其他古老、庞大的帝国一样,结局就是分崩离析,分裂成很多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而走上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然而,中国并没有走这样的道路。其中当然有许多很复杂的问题值得探讨:中国到底是怎样在一个非常不利于自己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时代背景下,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民族国家的道路?为什么能成功?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结构性约束是什么?当时行动者的战略目标和动机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其实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目前只有部分历史学者做了很多细致入微却又比较碎片化的研究,这类研究一方面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经验的细节很有帮助,另一方面则在理论上意义不是很大。解答这些问题,政治学是责无旁贷的。如果我们能够形成一个不同于民族国家而基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国家理论,那么中国政治学就有了很好的基础;如果对于这个问题都不能回答,无法提供新的理论,那中国政治学存

在的意义就令人质疑。

(二) 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理论

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社会主义中国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政治文明。新型就在于人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构,这一重构的集中体现就是前面提到的人民共和。古典共和,一是强调作为少数人的公民在政治中的优越性(公民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是指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二是强调公民的积极政治参与;三是强调公民的德性,德性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基础;四是强调共同体的利益即公共利益。将古典共和发展为现代共和的集大成者是美国,美国的政治文明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创建了一套真正不同于建国时人们所熟悉的古典共和政治的现代共和政治。首先是美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落实了选举权即政治参与资格,其次是美国把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纳入代议制轨道,从而创造了代议共和制,所以美国的政治体制有它的独创性。

同样,人民共和国在政治文明上也形成了独创性,中国的现代共和是人民共和。所谓“人民共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此有着精当的解释,其中的要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召开的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中,确立了一个政治方案,这就是政权“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制度。^① 这番话如果用政治学的话语来表述就是,人民共和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和而不是少数人(不管其基于何种理由)的共和,绝大多数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团结起来成为了一个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即人民。人民共和强调绝大多数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8页。

人都有政治主体资格,共和国为构成人民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共治、共享;同时人民共和也强调少数先进分子在政治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要把大多数人的政治主体资格和少数先进分子的领导作用结合起来。人民共和拒绝由出身和财富所决定的精英分子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转而突出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因此,人民共和就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对美国所创造的现代共和的超越,和对现代共和政治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人民共和就是中国创造的政治文明。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的前辈们都意识到了,但是学术研究方面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解释。比如什么是人民共和原理?革命成功之后的制度设计者们当时就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学术界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我的初步认识是,人民共和就是把组织起来的少数先进分子的领导作用和普罗大众的政治主体地位有机结合起来,在政治制度的支持下,围绕着创造美好生活、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共同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文明形态。人民共和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产物,集中概括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同时人民共和也规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并为它提供资源支持。

(三) 中国政治创造能力的理论

中国经历过半殖民地的状态,长期以来处在落后于欧美国家的不利地位,这对于我们的知识创造确实有不利影响。同时,我们的很多政治话语直接引进自日本翻译的西方政治话语,日本虽然没有经过殖民地化,但是“脱亚入欧”的历史选择使其内在地经历了或多或少的殖民地化的影响。这种历史经历体现在学术研究上的典型结果就是东方人被不同程度地“套进”了西方政治话语的“牢笼”。东方人,当然毋庸讳言,包括一些现代中国人,或多或少

都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创造能力表现出不自信,一些人甚至更为偏激地认为,中国无论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根源,其实就是一些中国人对自己的政治创造能力缺乏了解。

如果我们能多读一些中国历史(其实主要是政治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真的是一个极富政治创造能力的国家。大家熟知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这些就不说了,把时间拉得更远一点看,我们的祖先在迈入文明前后或者说在文明的预备阶段,就展现出非常厉害的政治创造能力。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写过一本讲中国青铜器的书(《中国的青铜时代》),通过考古研究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经历一个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文明其实非常辉煌,但是出土的青铜器都是礼器,很少有青铜农具。而青铜礼器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西方进入文明时代是生产工具发生变化的结果,但中国的青铜器都是礼器,生产工具没有明显的进步,却同样进入了文明时代。

据此,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不是靠生产技术的进步,而是靠政治创新。如何把当时地域上已经很广泛、不同的小邦国和部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广域的王权国家,靠的就是政治创新。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就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创新,古人要把很多部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广域的王权国家,那谁来当王呢?摆不平,所以就有了禅让。为了维持政治上已经初步形成的整合状态,就要找一个更加抽象的权威,这就是天,而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沟通天人,所以就要祭天,青铜器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统治的密码,青铜器的工艺水平之所以非常高,是其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功能使然,是服

^① 张光直:《中国的青铜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第482—497页。

务于维持国家的需要。以青铜器为媒介进行天人沟通,从而重新组织广大地域的民众,就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创造,它是中国古人的政治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而中国就是凭借这种政治创造力在生产工具没有发生大变革的基础上仍然能够步入文明时代。

中国古人的政治创造能力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源源不断地被激发出来,西周依靠宗法分封制建立了大一统国家,秦朝则依靠郡县制、官僚制重建了大一统国家,汉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通过吸收儒家意识形态和发明察举制,成功地建构了一个皇权与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群体(知识精英)的持续联盟;后来察举制僵化了,中国古人又创造出了科举制,经过唐朝的逐步积累,至宋代发挥出巨大的政治效能。没有政治创造能力,三千年的大一统国家是没法维持下来的,当然农业经济的繁荣也很重要,但更多的可能是靠政治上的变革。

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再次爆发出强大的政治创造力,创建了作为新型现代国家的人民共和国和作为新型现代政治文明的人民共和。如果认识了中国的政治创造能力,那么就不难理解,从西周至今的三千年里,中国变化之大、之深,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当我们不读历史、拒绝认识中国的政治创造能力时,就会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在现代政治上没有政治创造,更遑论根据中国的政治创造去提出话语、提供知识、创造理论了。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政治创造能力的产物和集中体现,是迈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中国的政治创造能力的“集约化”使用。因此,不要低估中国政治,而是要理解它、解释它,也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政治创造能力,要从时间长河中发现它,在我们的时代发展它。

Material, Knowledge and Theory: O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Marxist Politics

Shikai Wang

Abstract: Marxist politics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of Chinese socialism, the basis of the teaching of Marxist politics is possess and absorb the material thoroughly, the critical content of the course of Marxist politics are “one center”, “two pillars”, the organic unity integrate with three key factors, four bas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four basic political rights, and five political links. Further more, the the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Chinese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the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creative ability, that embody the innovative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s.

Keywords: Marxist politics; knowledge; theory; China
